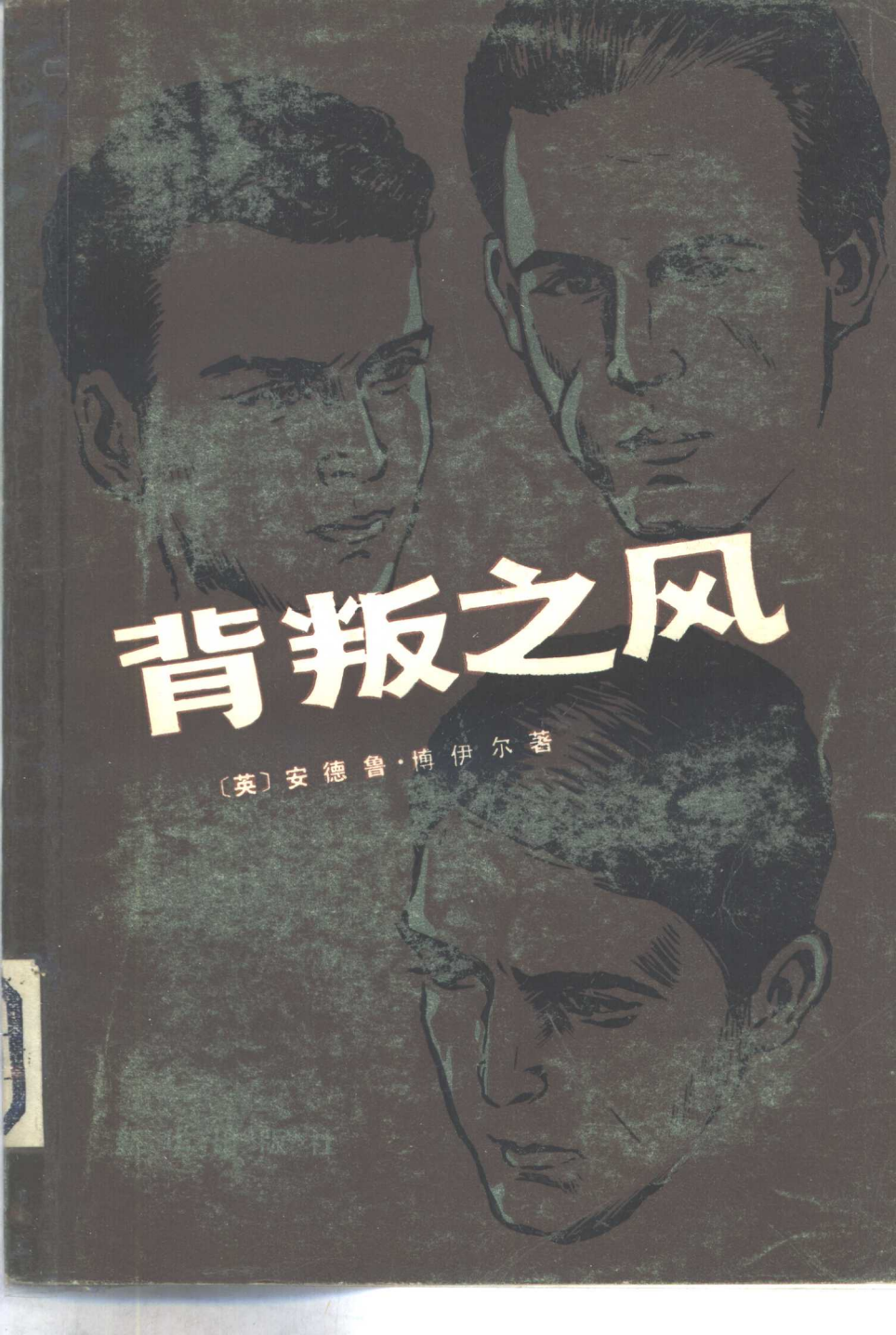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three stylized, high-contrast portraits of men. The top left portrait shows a man with dark, wavy hair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top right portrait shows a 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looking directly forward. The bottom portrait shows a 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The portraits are rendered in a dark, textured style, possibly using charcoal or a similar medium, with strong highlights and shadows.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ark, with shades of brown, black, and grey.

背叛之风

〔英〕安德鲁·博伊尔 著

新华出版社

背 叛 之 风

——充当俄国间谍的五个人

(英) 安德鲁·博伊尔著

斯 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作者安德鲁·博伊尔是英国的一位传记作家。这本书于1979年11月出版后，曾引起西方的轰动，也是当前西方的一本畅销书。书中叙述了三十年代五个英国人充当苏联间谍的经过。作者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性格，爱好和作风以及他们思想的演变过程。通过对这些间谍活动的描写，展示了苏联同美英互相争夺的一个侧面。

背叛之风

——充当俄国间谍的五个人

〔英〕安德鲁·博伊尔著

斯 华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湖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75印张 370,000字
1981年3月第一版 1981年3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18 定价：1.35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统治阶级的激进派.....	(23)
第二章 不合时宜的青年.....	(43)
第三章 人材物色者.....	(96)
第四章 魔鬼的信徒.....	(143)
第五章 趋炎附势之辈.....	(182)
第六章 骗取信任的人.....	(216)
第七章 双重身份的爱国者.....	(247)
第八章 内奸.....	(289)
第九章 第五人进来了.....	(336)
第十章 潜逃的间谍.....	(386)
第十一章 第三人出去了.....	(474)
结束语.....	(550)
注释.....	(567)

序 言

十八世纪的诗人托马斯·格雷说：“任何傻瓜都可以写一本有价值的书，只要他诚实地告诉我们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东西。”这话是颇有见地的；但是，想要搞清在三十年代被吸收当苏联间谍的一小批英国中产阶级大学生的双重生活的任何作家，是难以期待不折不扣地按格雷的意见去办的。英国的限制性很强的官方机密法以及间谍本人自然而然的欺骗性这类障碍，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然而，把写这样一个难题含蓄地斥为蠢举，我是“不服这个罪的”。在我之前敢于涉猎这个领域的其他作家们清理了一些问题，并且帮助发现了踪迹，而这种踪迹是上述保安当局不愿意让人发现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布鲁斯·佩奇、戴维·利奇和菲利普·奈特利，《观察家报》的帕特里克·西尔和莫林·麦康维尔，以及休·特雷弗-罗珀教授、E·H·库克里奇、杰弗里·霍尔、安东尼·珀迪和道格拉斯·萨瑟兰等人早些时候的努力，使我既感到鼓舞，又感到沮丧。要不是我成功地打开了新天地，并且得到了一些惊人的新证据，我是写不出这本书来的。我并不希望只是在越来越多的间谍书目中多加

上一本。

必须由读者来判断这本书的内在价值，因为书中的内容并不完全是有关间谍和间谍活动的。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加上英国的力量、财富和地位的不断下降，促成了一种不良的政治和社会气候，菲尔比、麦克莱恩、伯吉斯以及他们的亲密同伙就是在这种气候中成长起来的。然而，三十年代动乱还影响了其他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有经验的传记作家和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这场动乱如何并且为什么特别对这三个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这似乎是一个适当的题目。在克格勃和英国情报机关的档案对公众开放而让他们查阅之前，全部事实当然肯定永不会为人们所知。美国的新闻自由法为调研者提供了极少一部分事实。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一些敏感的材料除外——确实帮我搞清了几个难以理解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情报界原先的一些成员的引导，我是永远不会偶然碰到“莫里斯”或者“巴兹尔”的——这是给参加这一阴谋活动的第四人和第五人起的代号。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同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把我对这个问题所了解到的情况留给未来的调查者对这些同谋追查到底。

现在，人们肯定都知道这五个英国人为苏联搞了间谍活动，而我为什么决定要与这五个英国人玩往往把人引入迷途的数字游戏呢？为什么要按这样一种武断的办法——主要是报界于五十年代中期造成的——办事呢？答案是简单的。一旦金·菲尔比最终于一九六三年——在英国情报机关内部断

断断续续地辩论和怀疑了十二年之后——承认自己是和盖伊·伯吉斯一起安排唐纳德·麦克莱恩逃往俄国庇护所的第三人，就不能再回过头去采用不同的和更讲得通的排列顺序了。我把“莫里斯”和“巴兹尔”称为第四人和第五人，不是因为他们在扮演秘密角色方面一定不如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很出名的那三个人那样卖力或者成功，也不是因为他们当间谍的时间一定比较晚，而是因为他们恰好是我发现了踪迹的两个新的同谋。

我没有透露向我提供情况的那些知道此事内情的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名字，原因是很明显的。我不能透露“巴兹尔”和“莫里斯”的名字，原因就更明显了。这两个没有透露名字的英国人也为苏联搞了间谍活动。他们两人都承认了这一点。第一个是在华盛顿被中央情报局逼得走投无路并被揭露出来后供认的，第二个是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于莫斯科重新公开露面大约两年后向伦敦的保安当局供认的。由于这两个人都费尽心机而及时得到了相当于“皇家赦免”的待遇，所以，应该让上帝来“给他们起名字”。根据两个有关的情报机关的意见，他们的罪行被赦免，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各自的私利，同时也是为了酬报他们对英国权势集团内部背信弃义的方式作了重要的透露。

间谍工作是第二种最悠久的职业，而且无疑也是最不体面的职业。摩西在夺取迦南之前雇用过间谍，凯撒在英格兰登陆之前雇用过间谍，诺曼底的威廉后来在跨越大海从哈罗德手里夺取盎格鲁撒克逊的王位之前雇用过间谍，都铎王朝

和斯图尔特王朝在对付不服国教的天主教徒——他们愿意国王信奉天主教——的自卫斗争中也雇用过间谍。格雷厄姆·格林在评论菲尔比对自己在英国和苏联情报机关的双重经历所作的冷静但却是骗人的辩护时作了如下比较：

象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许多为了西班牙的胜利而出过力的天主教徒一样，菲尔比令人惊讶地断言，他的判断正确无误。他的这种判断是一个人的合乎逻辑的盲目信念。因为人们遭受过由人类的错误手段造成的不公正和残暴，所以这个人一旦发现了一种信仰，就不想失掉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极度痛苦是一种互相冲突的信仰之间的极度痛苦。对于有反叛思想和不满情绪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在处理当地的难题上表现拙劣的民主程序和共产国际最终的革命解决办法之间进行选择似乎是简单的。这就是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个失足的苏格兰加尔文派教徒如此快地上钩的原因。这也是才华横溢但不负责任的盖伊·伯吉斯扮演他的搞阴谋的同伙们的幕后人物这样一个不大可能由他扮演的角色的部分原因。菲尔比是一个比较冷静和有计谋的人，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巧妙的伺机而动的策略。他热衷于权力。他与其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冒险家。他靠欺骗起家，并成为无耻的骗子手。我认为，格雷厄姆·格林把菲尔比当作一个狂热的信徒是错误的——他身上没有一点牺牲精神。使他一直干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狂热的

信仰，而是因为他陶醉于完美的骗术。一九五〇年底伯吉斯成为英国使馆的官员后，菲尔比在华盛顿第一次暴露出他缺乏信仰（这是他必定要暴露出来的）。在断定这场游戏已经结束并逃往莫斯科去之前不久，他在贝鲁特再次暴露出缺乏信仰。

我并不期望大家都接受我对这些阴谋者中每个人的复杂动机和各异的特点所作的解释。我本人不认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这大概是一个明显的有利条件，使我可以站在客观立场上。就象读者们将会发现的那样，我对这个阶段以及他们在这个阶段中所处地位的了解，是看了近五百个证人的口头和书面证词后才得到加深的，这些证人从童年和学生时代开始就曾见过这些阴谋者。我愿意列举出全部证人的名字，但是限于篇幅，不能这样做。此外，他们中间一些人明确地向我提出要求：在按惯例列举感谢名单的时候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包括进去。这虽然有点令人费解，但是，他们的谦虚态度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不过，我尊重他们的愿望，就象我必须为以前曾在英国和美国情报界当过间谍的人的名字进行保密一样。这些人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有时候显然是互相矛盾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将会很激烈地反对我的见解和结论，其激烈程度就象在英美之间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下互相进行争吵一样，这种紧张状态是由于军事情报五处没能阻止麦克莱恩逃跑，后来又没能抓住菲尔比而造成的。但是，美国人只是在为前不久他们自己的错误和英国的错误付出代价。

十月革命后，苏联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英国。温斯顿·邱吉尔在一九一八年底曾警告说：“我们可以放弃俄国，但是俄国不会放弃我们。我们将实行退却，而它将会随之而来。这只熊正在迈动着带血的爪子，越过雪地走向和平会议……”当时，邱吉尔在战后劳合一乔治的联合政府中担任陆军和空军大臣，他坚持主张进行军事干涉，以便把俄国人民和全世界从布尔什维主义中拯救出来。他的意见被断然否定。用他的传记作家马丁·吉尔伯特的话说就是：他作为红色俄国敌人的姿态使他在政治上孤立，而他本人也感到恼火。然而，英国大多数政治家对于共产主义感到害怕和不信任，认为它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国王乔治五世内心也是持这种看法的；历届政府都不急于承认这个“工人国家”，或者不急于与它开展贸易活动。只是工党内有人实际上想要承认国际生活中的这个事实，并且与俄国的新统治者取得某种程度的和解。与此同时，工党领导人和他们的大多数支持者，坚决拒绝人数很少的英国共产党多次主动提出的与工党合并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最好不理睬过激分子，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尤其是在工党已经取代四分五裂的自由党而成为威斯敏斯特的正式反对派这样一个艰难的阶段。

工党先是于一九二四年执政，一九二九年又再度上台。它执政期间的无所作为倒没什么，其大臣们的温和态度和明显的良好意图却很令人吃惊。右翼已承认——但仍然是很勉

强的——他们是英国统治阶级的一员。国王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派人请来拉姆齐·麦克唐纳，并邀请他组织一个工党政府。国王在日记中写道：“我亲爱的祖母是在二十三年前的今天去世的。我不知道她对一个工党政府会有什么看法。”至少从理论上说，英国已经进入了平民百姓的时代。但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内阁是掌握不了真正的权力的，因为它每天的生存依赖于传统的执政党的支持。当然，工党没有现成的良方来解决劳资纠纷、不断增长的失业率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任何政党或者各党联合起来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从政治上继承下来的复杂问题。麦克唐纳和他的同事们付出了高昂代价才获得经验，而且简直是无所作为。英国共产党人则必须等待时机。一九二六年的总罢工在持续了九天之后终于失败，这九天中形势紧张，但暴力行动少见。共产党人未能利用这次总罢工，这说明那些工会还没有被死硬的过激分子所控制。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历届政府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以一种错误的感情为基础的，其部分原因是：大臣们和权势集团中其他成员一样，几乎没有花点心血去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他们仍然以厌恶的情绪来看待英国共产党人，认为他们是国内唯一的敌人。要说苏联人真能操纵中上层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背叛其阶级，那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可以不必认真看待。另一方面，也永远不能排除苏联代表搞阴谋活动和小型间谍活动的可能性。一九二七年警察对苏联贸易代表团的袭击使当局确信，他们在这方面的判断是

有充分根据的。无知和自鸣得意，使他们看不到苏联人越来越有可能暗地里企图从不断扩大的统治阶级的那些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其它高等院校学习的享有特权的子女中争取、吸收和选拔间谍。这一实际过程是逐步进行的。这个计划主要是由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这样阅历很广的苏联领导人设计出来的。李维诺夫是俄国前驻伦敦大使，他了解英国那种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在处于困境之中的英国既是其阶级结构的力量所在，又是其弱点所在。当局决不会怀疑年轻的大学生是不忠诚的，这些大学生已在接受训练，以便在权势集团的阶梯的较低梯级上承担他们的职务。

工党政府在一九三一年的财政和经济崩溃中丢脸地跨台了，从而为这一大胆的阴谋活动创造了合适的条件。由于政治上的失望而产生了不满情绪；在两所古老的大学中，剑桥大学更为积极，它起了带头作用。而警方和军事情报五处都没有过于注意共产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的传播。他们只注意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在大学里，能坚持下去的共产党正式党员相当少。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一事实表明，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一时的桀骜不驯。而这就是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纳恩·梅、“莫里斯”、“巴兹尔”和其他人在上大学期间作为左翼持不同政见者和潜在的苏联间谍而出现的气候。这是产生叛逆的气候。只有卡尔·马克思的最终解决办法可以把英国从它的最可恶的敌人手里解救出来，而遭到失败并已分裂了的工党现已成为这个敌人的统治阶层的一部分。

为什么中产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空想主义者中的少数人会如此容易地受到引诱，回想起来似乎仍然使人难以理解。不管怎么想入非非，马克思再次出现在英国这样一个政治上如此稳定的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羞愧和绝望的悲观主义已深深地扎根于很多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的思想中：年轻人特别认为他们在政治上的长者出卖了他们，这些长者大多数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遗老。这些人本来是可以使国家摆脱政治和经济萧条的，可是其中很多人都在“以战争结束战争”的过程中被打死了。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太大了，使人感到不舒服，这在中上层阶级中更是如此，而领导人都是从这两个阶层产生的。考虑一下下述情况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几乎没有什么例外，政治领导人都怀念过去，就象是在怀念繁荣与安定的黄金时代——他们在一九一八年停战后徒劳地希望恢复这样一个时代。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来使他们的希望得以实现。少数领导人认为这种白日作梦是毫无用处的，劳合一乔治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劳合一乔治作为一个既图谋破坏自由党，又设法使公众生活维持在较低水平的肆无忌惮的政治冒险家，在一九二二年被抛弃了。他再也没有东山再起。

政治上的长者认为，英国的困难可能是它在战场上打败德国及其盟国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而造成的，他们持这种看法也是犯了个大错误。实际上，英国的经济衰退在几乎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大英帝国正在其最后的、也是爱国呼声最高的阶段稳步地扩张着。帝国考虑的主要问题掩

盖了以本国为基地的贸易和工业的许多缺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结束之前，德国和美国的钢和化学产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开始超过英国。不久，在美国中西部平原上用机器收获的价格便宜的小麦也来抢英国国内生产的粮食的生意。当然，英国海外领土的新市场可以弥补这一紧张状况，并掩盖这种竞争的威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情况一直是国旗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狂妄的优越感是这个占地球面积四分之一的强大的“日不落”帝国的特点。

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这样的转折点：骄傲自大——古希腊人称之为傲慢——似乎为它自己招来了残酷的复仇女神。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英国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场上终于为推翻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帝国作出了贡献，但却付出了无法忍受的代价，而俄罗斯帝国则毁掉了自己，并使马克思主义的暴政得以在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警察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劳合一乔治本当永远不会忘记——如果他总是记住的话——美国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这位百万富翁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对英国钢铁制造商所提出的警告：“英国正在使用的大部分设备二十年前就应该废弃了。就是因为你们还保留着这些老掉了牙的机器，所以美国把你们甩在后面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不但这种机器已经落后了，而且曾一度是英国财富的基础的工业也已经落后了。政治家们现在所面对的，是只主张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的越来越强大的工会，以及不愿意搞现代化的资方。政治家们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希望其它国家的情况可能

更糟。

只有大英帝国仍然存在，但是那场不必要的、指挥糟糕的南非战争使帝国的坚不可摧的基础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破坏。征服爱尔兰人民的斗争于一九二一年暂时结束，这个海岛被分成了两部分：南面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自由国家，东北面是大部分人信奉新教的北爱尔兰——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妥协，它只能播下痛苦和暴力的新种子。大英帝国没有做什么事来拯救其衰落，这个帝国就象乔治五世所预见的那样，它不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大国了。据说，这位国王在一九三六年临死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大英帝国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李维诺夫的那个吸收中产阶级的大学生当苏联间谍的计划碰巧就在那时付诸实施。一旦当了见习间谍，这些大学生就不易回头了。回顾起来，我觉得比较令人吃惊的是，在三十年代期间，反政府骚动竟如此迅速地发生和蔓延开来，即便是考虑到了当年希特勒的上台和随后出现的反法西斯运动。

我属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的一代人。我清楚地记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我们作为八岁的孩子在学校里是如何受到这种教育的，即认为大英帝国最近由于和平解决办法而扩大了疆域，在我们的一生中大英帝国将继续存在下去。我们每年都在五月二十四日庆祝大英帝国节，这一天是维多利亚女王寿辰纪念日。我们举着国旗游行，并且唱吉普

林的献身赞歌：

祖国啊，我们向您保证：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热爱您，并为您效劳。

吉普林与乔治五世同岁，他也死于一九三六年。我现在发现，大英帝国的这位桂冠诗人欺骗了他自己，欺骗了国王，权势集团中的大部分人，也欺骗了我，他欺骗的方法是赞美一个统一体的伟大，而这种伟大象一个人常常无缘无故地傻笑那样只是一时的。我自然更欣赏 G·K·切斯特顿的朴实的现实主义：

统治英格兰的人们

在气氛庄严的秘密会议上会面。

啊！他们迄今还没有为英格兰

找到安息的坟墓。

我在为我的最后一本书——英裔爱尔兰爱国者厄斯金·奇尔德斯的传记——作调查的时候，偶然碰到了另外两个有关的、并且令人感兴趣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奇尔德斯很有远见，他看出，大英帝国注定是要完蛋的。他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一部分原因是他在南非战争中曾经当过炮手，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后来对英国处理爱尔兰问题的笨拙手法感到不耐烦。他早在一九一四年前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其他一些人

——这些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与奇尔德斯 的看法相同，同意他的悲观预见。第二个事实是：在某些转折点开始出现和公众知道这些转折点已经发生之间总是有一段时间间隔的。当年这种时间间隔无疑比现在要长，但奇怪的是，在困难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有这么多人——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长时间地、一个心眼地陶醉于幻想之中。三十年代将会迫使大家抛弃这些幻想。

例如：在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崩溃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亨利·福德的成就已完全驳倒了卡尔·马克思的可怕的预言。但美国经济萧条的影响很快波及到了整个文明世界。只有苏联逃脱了这一最坏的后果，这是因为它的经济是落后的，并且还因为它闭关自守。在伦敦，当英国于一九三一年夏天受到这场危机的打击的时候，乔治五世说服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领导一个应急国民政府——这显然是一个背叛，这一背叛使工党陷入了分裂，并且瓦解了它的士气。英国仍然是一个帝国的中心，它可以以便宜的价格从这个帝国的各地进口食品和原料，所以它能够在三十年代期间使失业率很高和非常贫穷的地区避免了激烈的动乱。出口额下降了，但是英国——它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被迫向国外出口制成品——通过从海外投资、海运业、保险业和金融业获得收入的办法避免了破产。这充其量是个短期解决办法。英国的处于停滞状态的重工业日渐衰落，而它本来是可以把资本投入这里发挥作用的。

共产党开始吸引新的成员。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人民委